

10年回望,那场“非典型”学术之争中的背影留给人们太多的评说和思考。10年来,他们依然行走各自的人生之路上,寂寞与喧嚣终成过眼云烟。

## 钟南山 洪涛:10年“公案”

■本报记者 郝俊

### 相反的两行足迹

正如钟南山自己所言,走过 SARS10年,他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加忙碌了。

“我从今天到周日上午在杭州开会,周日午回穗,晚上八点电话交班吧。若时间困难再联系。”3月29日,记者对钟南山持续近一个月的采访邀请迎来戏剧性转折,此前石沉大海般的预约短信和电话突然有了回音。

周日晚八点,记者如约拨通电话。“我正在赶飞机,现在不方便,大约两个钟头后到广州。”飞机因广州暴雨晚点,钟南山匆匆挂断电话。

两个半小时后,钟南山的秘书告知记者,钟南山下飞机之后,因有紧急要事直接赶回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,当晚恐怕不便再接受采访,此时已近午夜十一时。

难以想象,76岁高龄的老人还能承受如此快节奏、高强度的工作负荷,然而这对于钟南山而言,却似乎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。

回望 SARS,钟南山是无法绕开的标志性人物。10年前,他以“勇敢战士”的形象走进公众视野,他在那场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气和胸怀被媒体誉为“南山风骨”,以至于有人说“SARS成就了钟南山”。这些评价,除了映衬出他延续至今的昂扬斗志,更让人回忆起那场著名的“病原体之争”。正是在那场争论中,钟南山以大胆敢言、坚持事实的精神赢得尊重。

而争论中的另一位主角——首先宣布“SARS元凶”为衣原体的病毒学家洪涛,则在历经风雨之后很快淡出了公众的视线。在诸多媒体的 SARS10年回顾中,很少看到洪涛的身影。事实

上,在这一注定留下深刻烙印的历史事件中,洪涛同样是一位不该被遗忘的人物。

对于记者的采访请求,洪涛本人未予回应。他的秘书告诉记者,洪涛刚刚出院,因身体原因不便接受采访。尽管这是个巨大的遗憾,但所幸拂去历史的尘埃,在每个细节深处都留有值得后人重新发现的线索。

### 未能协作的“对手”

SARS是一场遭遇战,面对二连三的院内感染乃至患者死亡,医学界陷入迷茫,找到病原体,发现致病原因便成为当务之急。

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,洪涛于2003年2月7日投入非典型肺炎病毒的研究工作。很快,他首次通过电子显微镜在广东送来的标本中观察到,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衣原体。2月18日下午,他向社会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。

当晚相关权威媒体报道称:“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。”洪涛的结论被认为是获得了官方认可,“衣原体”之说也成为 SARS“已经得到控制”的“医学证明”。

然而,身处一线的广东医疗界人士对此结论并不认同,因为抗衣原体药物完全无效。钟南山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发言,认为这一结论科学依据不足,要鉴定一个病原体,除了形态学上有一定特点,还要进行遗传特点的分析,血清实验也非常重要。因此,不能按衣原体的结论制定治疗方案,“否则可能造成可怕后果”。

病原体究竟为何物?这成为此后两个多月时间内的未解之谜。直至4月16日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,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,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为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。由此,非典改称 SARS。

此后,洪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,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论有其局限性,为“一孔之见”,但在 SARS病人的标本试验中发现衣原体确为客观事实,自己“没有造假”。

回想寻找“SARS元凶”的曲折过程以及期间的冲突,钟南山认为,病原体查找过程中的最大缺憾,是病毒学家、公共卫生专家等没有能够与一线临床工作者进行很好的协作。“如果结合做,根本就不会发布这样的结论。”

争论过后,洪涛说:“作为科学家,在科学研究上遭遇的大多数是失败,很少遇到成功。”并告诫学人不要气馁,遇到挫折还要继续走下去。

洪涛的失误,招致外界的诸多非议,甚至有人提出要罢免他的院士资格,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然而抛开外界议论,钟南山始终认为,衣原体、冠状病毒之争是学术之争,而不是真理之争。不能说谁对了就是真理的代表,谁错了就是错误的化身。科学研究总是有一个过程。

### 草木皆兵下的科研结论

钟南山敢讲真话的品质感动了中国,而社会舆论对洪涛的疑问和指责却也成为事实。值得反思的是,当人们沉浸在对于“实事求是”的赞美之中时,似乎忘记了评价的对象是“科研发现”。在外界的质疑声中,最大的不解在于,一个

为科学奋斗终生的院士何以在仅仅观察了几个病例之后,就匆匆将结果公布于众?

但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都记得,媒体的权威信息和专家的意见,从未被社会如此迫切的需要过。病因不明、感染率极高、不透明的疫情通报让社会一度陷入恐慌,甚至被治愈的一些患者“像逃犯一样躲在家里”,四处草木皆兵。

在此情况下,洪涛所在的中国疾控中心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,要求他们尽快提交报告。有专家认为,为了平息社会的焦急情绪而向社会快速提交研究报告,这件事情本无过错。相反地对结论的怀疑反而加速了同行开拓思路。

随着病原体之争的落幕,国人也经历了一场从未知、混沌走向理性、坦然的过程。其中的当事人,却必须面对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——衣原体之说,让一位老院士一度身处学术之外的尴尬境地;另一边,“敢讲真话”的钟南山成为公众心中“良知”科学家的代表。

10年回望,那场“非典型”学术之争中的背影留给人们太多的评说和思考。10年来,他们依然行走各自的人生之路上,寂寞与喧嚣终成过眼云烟。毕竟科研没有止境,外界对科学家亦应多一份宽容。

对于人们“SARS成就了钟南山”的评价,钟南山并不认可:“我更愿意没发生过 SARS这样的灾难性事件。”

“我还是原来的我,不唯书、不唯上、不唯权、只唯实。”10年弹指一挥间,钟南山的这句心声,恐怕同样会在当年那个“对手”的心中产生共鸣。作为科学家,当年处于风口浪尖的洪涛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

“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:‘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人命关天,敢犯天条’。我对同事说,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,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,你们也没有人离开。”

## 杨焕明:这一年,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吴益超

对杨焕明来说,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。SARS过去的10年间,杨焕明和北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迁往广东——这两个地区都曾抗击 SARS的重镇。尽管并非有意为之,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。

北大基因如今的地址是深圳市盐田区内一栋白色的大楼,这家名列自然出版集团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的企业,因近日耗资1.176亿美元成功并购美国同行 Complete Genomics(简称 CG)的新闻而被炒得沸沸扬扬。而此前,美国政府曾传出称北大基因将借此研发“生物武器”的声音,这更令人想起 SARS期间的“生物武器阴谋论”。

“不要再谈 SARS病毒是什么外国人搞出来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了,没有事实依据,讲这种话反倒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科学研究很落后,做科学研究不能讲民族情绪。”与记者的对话伊始,杨焕明即提出这一点。

### 绕不开的“心头之痛”

对10年前,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,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。

2003年,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,无论是科研技术、力量还是设备,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,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,各科研单位在 SARS暴发初期,仍是条块分割,各自为政——这一点在 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,亦是杨焕明最难忘之处。

2003年5月29日,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 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:“目前,在非典型科技研究中,一些机构、一些科技人员,有的不善于合作,有的虚报成果,言过其实,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,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。”其所指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——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,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。

2003年春节过后,时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CDC)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;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、北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。而结果是: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,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,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。

彼时的北大基因,还只是由杨焕明、汪建等8名海外留学人员于1999年创办的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,并非“国家队”——2003年5月19日,中国科学院正式组建北京基因组研究所,北大基因研究中心才被“收编”。

既然是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,就没有相应获得非典型肺炎样本的权利。在抗击 SARS的战役中,中国卫生部有着严格的规定:除 CDC 可以将 SARS的样本带出省外,其余所有的科学家都不能向广东方面索要样本。

“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,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。”在杨焕明看来,正是当时对 SARS的过度反应,导致了中国在 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。

《经济观察报》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“很愤怒”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的报道则更为形象——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《杨焕明的心头之痛》的文章中,杨焕明那句“应该承认,在样本面前,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”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。

“其实这句话是个巨大的误会,我的意思不是中国科学界在 SARS研究这件事上的表现错了,而是面对抗击 SARS的使命,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。”

10年后回忆起这一细节,杨焕明对记者说:“当时有领导同志找我谈话,说怎么到了该做 SARS攻坚战正面宣传报道的时候,你杨焕明居然还公然唱反调。”

### 人命关天,敢犯天条

2003年 SARS大规模暴发前夕,杨焕明正在法国参加会议,但他却深刻感受到了国际同行对中国隐瞒 SARS疫情的质疑以及国外舆论的巨大压力。回国后,杨焕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大基因研究中心内部做攻关动员。

“我就对同事说了16个字:‘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人命关天,敢犯天条’。我对同事说,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,希望即使没有我的动员,你们也没有人离开。”

但没有 SARS病毒样品,基因组序列研究仍是无米之炊。“我们当时不是拥有 P2、P3 实验室(生物安全防护二级、三级实验室)的单位,按规定不能搞 SARS研究,但是国家有难,我们还讲什么呢?”

突破口出现在2003年4月15日凌晨2时,4

株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无偿提供的、从 SARS患者组织样本中提取的冠状病毒被送到了北大基因研究中心。

基因组序列研究的马达随即全速开动,到2003年4月16日上午两株病毒的序列已被测出,当日下午另外两株的序列也完成测序;4月18日7时,患者血液中的样本病毒蛋白被鉴定;4月19日凌晨2时,经过近100个小时的努力,样本冠状病毒抗体检测酶免试剂盒终于在全国率先研制成功。

分析基因组序列获得的新发现,对于确定样本病原,分析病毒传播和发病机理具有重要意义,还能开发诊断试剂、疫苗和预防治疗药物提供重要信息。

但杨焕明组织招募科研志愿者的情况却颇为尴尬,“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人才,令人失望的是,没有科学家愿意加入。”

“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安全,出了人命谁负责;其次想的是钱,没钱做不了。”当时的北大基因因为完成人类基因组1%计划和水稻全基因组测序,“已经欠了一屁股债”。而在这两项研究累计花费的2.8亿元经费中,只有1亿元来自国家拨款。这意味着北大基因必须自己掏钱干,有了成果再向国家政府“伸手要钱”,汪建曾形容该方式为“吃完饭饭馆埋单”。

杨焕明后来对参与研究的同事说:“不管要命不要命,都要上。不管有钱没钱,都得做。”

尽管华大的同事们也认同这一理念,但一个紧急的状况还是出现在北大基因的研究室内——一位研究人员发烧了。在当时,发烧被视为感染 SARS的一个主要体征。

为了这个特殊的病人,杨焕明在病房门口坐了整整一夜。“如果是 SARS,第二天我们整个大楼就要关闭,所有的科研计划都将结束。所以烧不退,我不报病例!”杨焕明心有不甘,因为北大基因已经在 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上落后国外,不能让后续研究就这样被埋没。但按照当时的防治规定,疑似 SARS病例和疑似患者等。

所幸这一突发状况最终有惊无险,同事的烧在第二天便悄然退去。“我的天哪!”采访中,杨焕明突然发出一声长叹,神情已经似乎游离到了那个时刻。

对基因组序列研究,杨焕明有着很强的自信:“对疾病研究来说,只有通过基因组研究才能真正揭示生命、病原的本质,这是100%肯定的,不管其他哪一种检测标准都是有问题。”

### 未曾走出的“阴影”

杨焕明今年61岁,鬓角微白。SARS后的10年人们记住这个名字的,更多的是依靠 SARS之外的几个关键词:首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,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主席,2007年当选中科院院士,2011年3月成为唯一担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马生物伦理学顾问的中国人。

2013年春节刚过,全国各地媒体就相继推出 SARS10年报道。但与钟南山遭受媒体“围剿”的境遇不同,杨焕明的 SARS往事却很少被媒体提及。搜索近期与杨焕明有关的报道,点击率最高的是关于他所著科普读物《“天”生与“人”生:生殖与克隆》获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消息。

与1999年创立华大基因时相比,杨焕明如今已低调许多。采访前,记者曾一度担心他不愿接受访问。但当杨焕明在2013年两会期间接到约采访短信后,就让助手第一时间回复了记者。

“SARS这个事情,确实需要好好总结一下。”在外漂泊多年,杨焕明仍是一口浓重的浙江乡音。“我们走出了10年前的阴影,现在又走进了新的灾难性传染病可能降临的重大阴影。”

但在杨焕明的理解中,这种阴影下的生活并非不正常的,“一个未知的病原,就像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性事件一样,平时大多数时候都是正常的,或许仅仅某个诱因,突然就爆发了”。最让他难以忘却的还有当时全国上下对 SARS的过度反应。“当时只要迅速隔离就可以,但是一些言论搞得社会上人心惶惶,这些缺乏科学理性的表现都不可以被忽视。”

但假如 SARS再来一次,杨焕明会作怎样的选择?

“一是尽快启动相关应急预警机制,二是用基因组学的方法鉴定是何种病原,三是通过适当的分享样品机制,让大家一起研究、识别病原。”

2011年5月,德国暴发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,华大基因5月27日收到病原样本,6月2日完成基因组序列并公布序列,6月7日研制成功酶免试剂盒并无偿公开检测方法,速度之快令世界咋舌。

“SARS一定还存在,但我们要认识到,假如人类能够衡量、鉴定的细菌占所有细菌种类的0.1%的话,那么我们能够认识的病毒就只有所有病毒种类的0.0001%。”

## 孟学农:心在哪里安放

■郭春孝

曾经的北京市长、山西省长,如今的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、中央直属机关党校校长——当敏锐的媒体从2010年新华社一篇报道中捕捉到孟学农履新的蛛丝马迹并争相报道时,人们却对这位曾被称为中共“十六大”政治新星的官员有了更复杂的情感。

2003年4月20日因处置 SARS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常务副书记,并获批准辞去北京市长;2008年9月14日因山西省襄汾县“9·8”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、常委、委员职务,并获批准辞去山西省长。

行政问责“典型”、悲情官员、“实为罕见”二度请辞的省部级高官……10年间,媒体和公众在这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官员身上,安放了太多概念。

93天,是由媒体精确算出的,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的时间。有媒体甚至据此称孟学农为“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任时间最短的市长”,但这并不能说明孟学农在政治上毫无作为。

1993年上任北京市副市长之初,便很漂亮地处置了北京市火车站广告牌倒塌事件,之后的一年他也出色地完成了首都国庆45周年的相关筹办工作,而在北京市的“菜篮子”、“米袋子”工程中,孟学农亦赢得了不少北京市民的情感加分——但这些政治作为最终都因为 SARS的蔓延,而逐渐被人们忘却。

377天则是用来计算孟学农担任山西省省长天数的数字。2007年初到山西,孟学农将这个当年因“困难”而伤痕累累的中国大省形容为“一本厚重的书”,希望成为“全身心投入的建设者”,并在自己写的那篇《感知山西》中强调“落不到实处,一切都是空谈”——但他或许想不到,致使这一政治理想被搁置的导火索不是空谈,而是一年后后的溃坝事故。

请辞山西省省长后,孟学农搬回了北京,也拒绝掉了所有采访,开始了深居简出的赋闲生活。但他并未从此消失在人们视线中,2009年7月7日,孟学农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发表了抒情诗《心在哪里安放》:“融入吧,像细小灰尘一样,冉冉升起悄然落下,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。”

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,作为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,孟学农在北京代表团小组会议上不无焦虑地表示:“有些官员面临三年不升迁时的心理躁动。”

与这份焦急相比,部分时评人更愿意将孟学农的复出与行政问责制的落实、政务公开的透明度相挂钩。从这一点上说,10年之后的孟学农,依旧被安放在了某种符号意义的位置上。或许,与这位官员的个人命运相比,人们更关注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的某些制度设计。

## 张文康:向前走,莫回头

■郭春孝

近日来袭的 H7N9 疫情,或许多多少少勾起了国人关于十年前的那场 SARS攻坚战,而对73岁的张文康来说,SARS已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名词。

与孟学农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相比,同样因 SARS而“下课”的张文康,仕途命运则更“恰当”——自2003年10月至今,张文康已在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位置上坐了9年零6个月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此前的报道,张文康“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办公室总是空着的”,“他没有分管工作”。而翻阅近期有关张文康的报道,大多以调研基层卫生机构、视察地方工作、出席会议为主。

同曾经负责的卫生部相关工作相比,张文康如今的工作并不算是忙碌。但10年前,作为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则正因 SARS而四处奔走。

2003年4月2日播出的《焦点访谈》栏目中,张文康强调“SARS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,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都已治愈出院了”。

而这一言论与当时国外的新闻报道普遍相左。2003年4月7日,在国务院新闻办一场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记者招待会上,张文康面对的是外国记者的一片质疑声。

与当时中国政府处理部分事故的“传统”思路相比,张文康的言论或许并未“出格”,但正是由于在 SARS疫情上的隐瞒,中国的形象才在世界面前一落千丈。痛定思痛之下,官方的态度悄然改变。

2003年4月20日普遍被看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天,张文康、孟学农两位高级官员被宣布免职。相关数据也相继被发布,4月24日20时,北京市报告的非典型肺炎猛增为877例,这与4月5日张文康通报的“截至3月31日,北京市共计12例”相去甚远。

如今的张文康,已不再对媒体谈起任何有关 SARS的话题,这份回忆在他心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,我们亦不得而知。但他最近的一条新闻却恰恰和曾经的抗击 SARS重地广东有关——2013年1月19日,他以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视察了广东省某市卫生局,并对该市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六字要求:“向前走,莫回头。”

10年之后故地重游,张文康的这六个字,不知是否有着某种自勉的意味。